

伪书背后的西学知识史：托名利玛窦之《理法器撮要》考*

□ 陈 拓

摘 要：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伪书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本文对《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理法器撮要》明确抄袭嘉庆年间徐朝俊所著《高厚蒙求》前四集进行了辨析，反驳了《高厚蒙求》受《理法器撮要》影响之说。《理法器撮要》约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其托名利玛窦应为出售以牟利。清中叶常被视为西学东渐史上的断裂期，伪书的产生反映出当时一些有经世之志的读书人对西学著作的渴求，这使伪托有利可图。

关键词：利玛窦 徐朝俊 《理法器撮要》 《高厚蒙求》 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K249.3；N91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2.01.006

一、《理法器撮要》与《高厚蒙求》的先后之争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晚明极具影响力的欧洲传教士，其中文著作已被汇编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收录有《理法器撮要》三卷，分理卷13篇、法卷3篇和器卷12篇，见表1所示。^①该书仅有抄本传世，题“明泰西利玛窦撰”，末附署名“求自楼主人”的短跋称：“戊寅初夏，借得汲古阁毛氏钞本，因令胥钞录一通。”整理者认为“戊寅”较有可能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并指出该抄本“包含着利玛窦的未刊稿”。^②其后，学界普遍将《理法器撮要》视为利玛窦著作进行征引和研究。

许洁、石云里已辨其非，他们认为：《理法器

撮要》理卷中只有五篇与利玛窦《坤輿万国图说》《乾坤体义》的内容有关，而且这五篇中有四篇均不同程度掺入了一些其他内容；法卷“全部”抄自梅文鼎（1633—1721）《三角法举要》《句股阐微》《方圆幂积》等书；器卷则与徐朝俊所撰《日晷测时图法》《星月测时图法》《定时仪器》有关，他们推测或器卷抄自徐朝俊著作，或器卷与徐朝俊著作均源自另一种著作，但“我们尚无法在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③董杰也曾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理法器撮要》的出现与阮元（1764—1849）搜集《四库全书》未收书有关，系有意作伪，但他关于《理法器撮要》内容出处的分析，则沿袭许洁、石云里之说。^④于是徐朝俊著作与《理法器撮要》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甚至有学者认为系徐朝俊抄袭《理法器撮要》。^⑤之所以会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序跋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M68084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佚名：《理法器撮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91—802页。

② 同上，第691—694、802页。

③ 许洁、石云里：《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日本《或问》2006年第11号，第15—24页。

④ 董杰：《〈理法器撮要〉的作伪意图及其价值探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5期，第9—11页。

⑤ 例如邓可卉称：徐朝俊《日晷图法》中“利器九则”与“总法五则”的内容，“与利玛窦的《理法器撮要》中的相似，由此可以肯定，徐朝俊作为徐光启的五世孙，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法。”参见邓可卉：《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国日晷研究的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5期，第693页。

出现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们未将《理法器撮要》与徐朝俊《高厚蒙求》的内容进行细致对勘，被抄袭者于是反成了抄袭者。因此，《理法器撮要》各篇的详细出处，尤其是它与徐朝俊著作的时间先后，尚需进一步厘清。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真正探讨《理法器撮要》是否确系伪书，何时作伪，由谁作伪，如何作伪，为何作伪等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徐朝俊及著作《高厚蒙求》略加介绍。^①徐朝俊（1752—1823），字冠千，号恕堂，江苏松江府娄县（今属上海）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岁贡生。他自称：“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俊于制举业暇，尝从先君子侧闻绪论。”^②他虽出自西学世家，

但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是徐光启（1562—1633）后裔。他受父亲徐世懋（1726—1803）影响甚大，徐世懋擅长“割圆八线之学，如《御制数理精蕴》、梅氏历学诸书，皆能掩卷讲论无漏义”。^③《高厚蒙求》共五集，由徐朝俊历年所著西学（主要是历算学和地理学）论著汇辑而成。其中《理法器撮要》仅涉及前四集，这四集陆续刊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至嘉庆二十年（1815）间。第五集则是徐朝俊去世后，由其子徐炳枢（1785—1839）刻于道光九年（1829）。我们将《理法器撮要》与《高厚蒙求》等书进行对勘，其源流关系见表1：

表1 《理法器撮要》内容出处表

卷数	《理法器撮要》篇目	出处	《高厚蒙求》篇目	
《理法器撮要》 卷一（理卷）	原天	待考		
	释藏天轮图			
	浑天图			
	量天测地法			
	日月交食	前半部分出自《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		日月食
	晷影一寸千里辨	待考		
	星图			
	紫微图			
	天体			天体
	地体	《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		地体
	天地相离远近			九重天离地远近
	日月地球大小			日与地球大小远近
	七曜行度			七曜行度
	七曜形体大小（附经星数）			七曜经星大小形体（附经星数）
步天歌	步天歌、经天该			

① 关于《高厚蒙求》，可参考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年第2期，第77—95页。

②（清）徐朝俊：《天学入门自序》，《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清嘉庆十二年（1807）云间徐氏刻本，第1a页。

③ 学界普遍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四世或五世族孙，甚至四世或五世孙。例如王尔敏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四世后裔，参见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第77页。从徐朝俊家谱可知，他实为明朝首辅徐阶（1503—1583）嫡弟徐陟（1513—1571）的后裔。关于徐朝俊及其家族，参见陈拓：《旧西学与新变局——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在19世纪的再发现》，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第25—45页。

(续表)

卷数	《理法器撮要》篇目	出处	《高厚蒙求》篇目
《理法器撮要》 卷二(法卷)	平三角法	第 732—750 页出自梅文鼎《平三角举要》 ^① 卷一、三、四	
		第 751—752 页出自梅文鼎《句股阐微》 ^② 卷一	
	勾股	第 753—754 页、第 765—772 页出自梅文鼎《句股阐微》卷一	
		第 755—764 页出自梅文鼎《平三角举要》卷四、五	
		第 763—776 页出自梅文鼎《句股阐微》卷四	
方圆幂积	梅文鼎《方圆幂积》 ^③		
《理法器撮要》 卷三(器卷)	利器九法	《高厚蒙求》三集之一《日晷测时图法》	制器(目录题:利器九则)
	总法五要		总法(目录题:总法五则)
	面南地平晷		面南地平晷
	罗经平晷		罗经地平晷
	平晷加节气线法		加节气平晷法
	面南天顶晷		面南天顶晷
	东西晷		面东西晷
	葵心晷		葵心晷法
	中星仪表	《高厚蒙求》三集之二《星月测时图法》	中星仪作法
	中时盘式	待考	
	测日躔表	《高厚蒙求》四集之二《揆日正方图表上》	测日躔表法
	时刻盘	《高厚蒙求》三集之二《星月测时图法》	测夜时晷二种
	定时刻线捷法	《高厚蒙求》四集之二《揆日正方图表上》	定时刻线捷法

注:《高厚蒙求》各篇目,凡目录与正文标题不一致者,本表均以正文为准;差异较大者,则注明目录标题。表中页码均指《理法器撮要》在《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的页码。

从表 1 可知:不仅《理法器撮要》器卷中有 11 篇抄自《高厚蒙求》,理卷中也有 7.5 篇抄自《高厚蒙求》,而且是原文照抄,仅粗加删改。理卷这 7.5 篇,全部囊括了许洁、石云里所认为的

① 收入(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 50—5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95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50—515 页。

② 收入(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 46—4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95 册,第 209—349 页。

③ (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 5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95 册,第 556—578 页。

与利玛窦著作内容相关的5篇（即天体、地体、天地相离远近、日月地球大小、七曜形体大小），^①因此这5篇实际也直接抄自《高厚蒙求》，而非利玛窦著作。徐朝俊在撰写《高厚蒙求》时参考了大量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其中仅明确标注出处者即达12种，含《御制数理精蕴》、李之藻（1565?—1630）辑《天学初函》《浑盖通宪图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恒星出没表》《测食》《远镜说》、阳玛诺（Manuel Diaz, 1574—1659）《天问略》、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天文历法书、《坤輿格致略说》、王应遴（?—1645）《经天该》、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职方外纪》、朱雱（1621?—1701年后）注天文历法书。^②因此，《理法器撮要》中自然含有利玛窦所输入西学的个别影子。清中叶，传教士在中国大陆相对缺位，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国人自著西学书，成为传承明末清初西学知识的重要文本载体。

二、《理法器撮要》的作伪策略

下面我们进一步论证，《理法器撮要》如何抄袭《高厚蒙求》，并刻意掩盖其作伪意图。

首先，作伪者刻意删去了《高厚蒙求》所标注的文献出处。例如理卷“地体”篇：徐朝俊

《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地体”，有文中夹注称“说本《天学初函》”。《理法器撮要》将此文献出处信息删去。^③《天学初函》刊刻于利玛窦逝世之后，与作伪者托名“利玛窦”存在明显矛盾。又如理卷“七曜形体大小（附经星数）”篇：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七曜经星大小形体”所附“经星数”，有文中夹注称“此皆本朝南公怀仁所定之数，与旧测互有异同，兹从新测”。《理法器撮要》也将此夹注删去，但数据却跟《高厚蒙求》所依据的清初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新测数据完全一致。^④再如器卷：徐朝俊《高厚蒙求》三集《日晷测时图法》“总法五则”后，有徐朝俊按语：“器法用之既熟，便可按图说以作晷，兹就先君子所口授，而择世所适用者几种以付刊。”^⑤换言之，“面南地平晷”“罗经平晷”等均为徐朝俊家传之学。此段文字未见于《理法器撮要》。

其次，作伪者的西学知识有限，出现了不少低级错误。例如作伪者将徐朝俊《高厚蒙求》第三集《日晷测时图法》中“平晷加节气线法”与“加节气平晷法”混淆了。《理法器撮要》器卷“平晷加节气线法”之图实为《高厚蒙求》“加节气平晷法”之图，见图1、图2。^⑥作伪者为掩盖作伪痕迹，还特意将《高厚蒙求》原图中汉字时

① 《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第22—23页。《理法器撮要》卷2第741页“异乘同除图”值得注意。活跃于嘉道时期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陈杰（浙江乌程人）曾论述比例方法，特别强调其在中国古代称为“异乘同除”，在西洋称为“比例等”，利玛窦等所论是源自中法：“比例之法昉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钱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即得。此西法也。古法在元明时，中土几已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之书，中土人皆矜为创见，其实所用皆古法，但易其名色耳。”诸可宝（1845—1903）在《畴人传三编》“陈杰传”中，除长段征引该文外，并在“论”里称赞陈杰“专精比例，当时奉为大师，岂幸致哉？至谓西人窃取乘除而为比例，窃取句股而为八线，良非虚语。”参见（清）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3，见（清）阮元等撰，冯立昇等校注：《畴人传合编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7—538页。而《理法器撮要》却将“异乘同除图”系于利玛窦名下，可谓历史的讽刺。

② 《旧西学与新变局——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在19世纪的再发现》，第29—36页。

③ （清）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地体”，第2a页；佚名：《理法器撮要》卷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726页。

④ （清）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七曜形体大小（附星数）”，第10b页；佚名：《理法器撮要》卷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730页。

⑤ （清）徐朝俊：《高厚蒙求》三集《日晷测时图法》“总法五则”，清嘉庆十四年（1809）云间徐氏刻本，第8b页。

⑥ （清）徐朝俊：《高厚蒙求》三集《日晷测时图法》“加节气平晷法”，第12a页；《理法器撮要》卷3“平晷加节气线法”，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793页。

辰换成罗马数字，但作伪者显然对罗马数字并不熟悉，乃至出现一些误写和生造的数字。与之相反，徐朝俊则擅长制造西洋钟表，所著《自鸣钟表图法》（收入《高厚蒙求》第三集）被誉为“国人第一部关于钟表之著作”，^①因此他对罗马数字非常熟悉。又如《理法器撮要》法卷各图，作伪者刻意颠倒了梅文鼎原书中各图的顺序，以致内容较为混乱，缺乏逻辑性，不似精通数学者所为。此外，《理法器撮要》中未抄袭徐朝俊、梅文鼎著作的各篇，笔者虽暂未找到其明确的出处，但它们均与西学无关，这也侧面反映出作伪者的知识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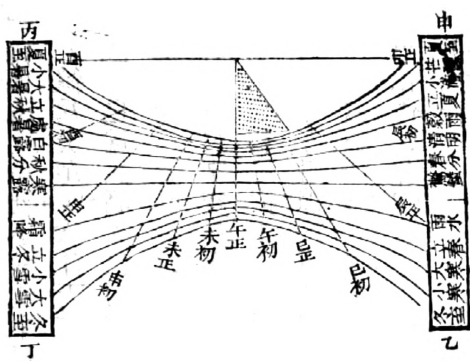


图1 《高厚蒙求》“加节气平晷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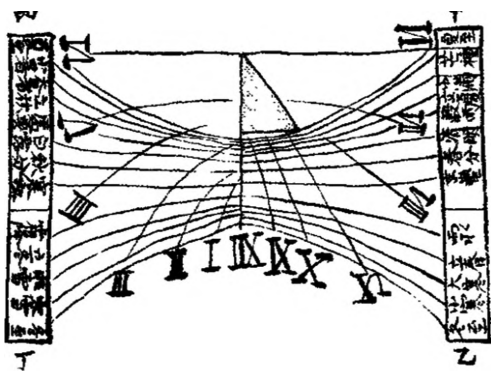


图2 《理法器撮要》“平晷加节气线法”

最后，作伪者还留下了一些作伪痕迹。例如《理法器撮要》理卷“步天歌”称：“《步天歌》，

即《经天该》，与古时步天歌颇有互异，盖西方土士所集编也。今此篇已刻入天文集中，人所易得易见，故兹不复载。”^②《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原分为“步天歌”（古歌）、“经天该”（西歌）两部分。《理法器撮要》“不复载”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高厚蒙求》此部分篇幅过长（第13b—29b页），作伪者懒于抄录全文。而所谓“天文集”当暗指《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作伪者无意间透露了其底本。

三、伪书背后的西学知识史：清中叶汉文西学文献收藏热

从上述考证不难看出，作伪者为以假乱真，可谓大费周章，这使后世研究者为其所骗。那么，作伪者究竟是何人呢？关于作伪者的身份，董杰认为：“《理法器撮要》的作者抄录相关著作的过程中，对原有内容进行修改，其中某些修改的确较原书的介绍更为清晰、明了。这说明作伪者不但掌握原书内容，并且有所领悟，故其身份不可能是普通民众，也不会是有名的学者，而是普通的士人。”^③实际上，厘清《理法器撮要》抄袭《高厚蒙求》后，我们可知这些所谓的“修改”乃是出自徐朝俊之手，而非作伪者。因此，笔者倾向于作伪者是一名书估或下层文人，作伪的目的应为出售以牟利。求自楼主人称：“戊寅初夏，借得汲古阁毛氏钞本，因令胥钞录一通”，^④伪托者是不是求自楼主人本人，我们不得而知。毛晋（1599—1659）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藏书家，伪托毛晋汲古阁抄本，既可佐证其真，又可高昂其值。综合全书风格及“令胥钞录”等跋文内容看，求自楼主人抄录该书的时间当在清亡以前，再结合前文中《高厚蒙求》的刊刻时间，可知“戊寅”当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或光绪四年（1878）。^⑤又由于光绪年间，新西学已取代明末清初时期输入的旧西学成为主导性的西学知识，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2—644页。

② 《理法器撮要》卷1，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731页。

③ 《〈理法器撮要〉的作伪意图及其价值探析》，第11页。

④ 《理法器撮要》附录《求自楼主人自识》，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802页。

⑤ 汤开建认为“求自楼主人”是乾隆年间官刑部郎中的蒋楫，而“戊寅”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并据此否定许洁、石云里和董杰之说，显误。参见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51页。

因此晚清虽出现过一批伪托的西学著作，例如题“李善兰壬叔撰，张之洞刊行”的《西算心悟》实即张楚钟（1819—1878）《算学心悟》，题“英国傅兰雅口译，金匱华蘅芳笔述”的《代数菁华录》实即方恺（1839—1891）《代数通艺录》，但其伪托对象均为晚清新西学的代表人物。^①故《理法器撮要》抄录于嘉庆二十三年的可能性更高，作伪者因此未能利用刻于道光九年的《高厚蒙求》第五集。当时《高厚蒙求》作为家刻本，第四集嘉庆二十年才付梓，流通范围有限，而且与传教士所撰书内容相似度很高，真伪难辨，又含有一定的新知，能引发购买者的阅读兴趣，于是被作伪者选为抄袭对象。

乾嘉时期朴学兴盛，历算与輿地是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永（1681—1762）、戴震（1724—1777）为首的“皖派”和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是佼佼者。在他们的带动下，学界兴起了一股对中西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著作的收藏热。书估由于知晓他们的喜好，于是有人甚至上门向其高价兜售此类书籍。例如阮元的幕僚——数学家李锐（1769—1817），在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初七日的日记中记载：

书友朱姓持卷子八幅求售，乃康熙甲寅岁治理历法南怀仁所造《地球图》也。前二幅系总说，后六幅每合三幅为一圆图，状地球之半，合两半圆则地球全图也。其相接处为赤道，四旁注二至、昼夜刻数。分大地为四大州：曰亚细亚、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墨利加。因索价太昂，即还之矣。^②

朱姓所欲出售的《地球图》，即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所绘《坤輿全图》。李锐显然对此图非常有兴趣，但由于索价过高，而李锐又财力有限，故与其失之交臂。《坤輿全图》在李锐生活的年代，

当已较为稀缺，同时在学界又颇有市场，不愁销路，所以书估方能漫天要价。

又如李锐嘉庆十年（1805）七月初七日的日记记载：

书客以《授时术草》索售，云是勿庵先生所批，以文意验之，良是。此书搜访二十年，未得一见，今忽遇之，不觉狂喜。草草写成一册，异日当另用楷书录之。惜无《五星》一篇，未审勿庵抄时已阙否，或是勿庵未曾抄也。^③

“勿庵”即梅文鼎，《授时术草》为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郭守敬（1231—1316）所著。李锐自称已搜访该书20年，但或许也是因为索价过高，李锐并未直接购买该书。相比之前与《坤輿全图》失之交臂，这次他却幸运地从书估处抄录得一副本。此类搜寻中西历算与輿地文献的记录，在李锐《观妙居日记》中频繁出现，且为群体性而非个体性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坤輿全图》和《授时术草》均系书估直接上门兜售，书估及其售书活动与清代学术风气的嬗变互相激荡，他们在西学东渐史中扮演了中介角色。^④

综上，清中叶汉文西学文献既获取困难，又有市场需求、价格高昂，此系伪书诞生的时代土壤。利玛窦在明末清初传教士中知名度最高，约在嘉庆二十三年，书估等为牟取高额利润，抄掇徐朝俊、梅文鼎之书，伪托为利玛窦所著，便不难理解。

四、余论

《理法器撮要》并非利玛窦名下唯一的伪书。例如《辩学遗牍》中所收《利先生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⑤内容是驳难云栖株宏（1535—1615）的《竹窗三笔》，实际却撰于利玛窦去世

① 李迪：《清代盗名盗版算书几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第90—92页。

② 录文与影印参见冯锦荣：《乾嘉时期历算学家李锐（1769—1817）的生平及其〈观妙居日记〉》，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9年新第8期，第273、284页。

③（清）李锐：《观妙居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据清嘉庆年间稿本影印，第240—241页。影印本仅含嘉庆十年六月至十二月、嘉庆十五年一月至七月的日记。

④ 关于书估，可参考徐雁平：《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第16辑，第99—158页。徐文未涉及西学类书籍。

⑤ 收入（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651—687页；《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664—679页。

后。据1615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记载，它是徐光启执笔，并由“李之藻补充了几点关于死亡的论点，莲池提出来了这个论题，但徐光启因为对此论题不太熟悉，就没回应”^①，因此是徐光启和李之藻合作的成果。

宗教论著的伪托，普遍是借名人效应以宣传思想；而科技论著的伪托，则往往另含有商业等目的。除利玛窦外，徐光启也由于知名度高，常成为历算学书籍的伪托对象。^②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定法平方算术》抄本，题“徐光启著”，被视为徐光启著作收入《徐光启著译集》和《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数学卷》，^③内容实际抄自《数

理精蕴》卷11“平方”与“带纵平方”两节。《数理精蕴》编成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而徐光启已逝世于崇祯六年（1633）。^④又如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藏《割圆八线互求法》抄本，内阁文库本无署名，东京大学图书馆本则题“徐光启校阅”，内容实际主要出自梅文鼎《平三角举要》，但掺杂了作者自己的理解和领悟。^⑤

伪书在中西古典文献中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研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伪书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伪书作为知识再生产中的一环，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与知识史意义。^⑥对待此类伪书，既要辨其伪，又不能因其伪而弃之不顾。

（陈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① 参见刘耿：《十七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8年，第185—186页。

② 汉文天主教文献中也不乏伪托为徐光启的著作，参见Ad Dudink，“The Image of Xu Guangqi as Author of Christian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Appraisal),”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 (1562—1633)*. Eds. Catherine Jami, Peter Engelfriet and Gregory Blue. Leiden: Brill, 2001, pp. 99—152.

③ 收入（明）徐光启：《徐光启著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四，第43—73页。

④ 李文铭：《再论〈定法平方算术〉非徐光启的著作》，《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2期，第155—157页。

⑤ 董杰：《日本内阁本〈割圆八线互求法〉考述》，《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第79—85页。

⑥ 除伪托外，文字改窜也是明清西学东渐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参见方豪：《〈天主实义〉之改窜》，《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1593—1603页；陈拓：《文献层累与形象塑造——晚明首辅叶向高与天主教》，台北《新史学》2018年第29卷第2期，第119—164页。

ideological crisis in Europe in the 17th century, Bernier'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regarded the "three Book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 unified whole, interpreted Confucius as "the science of the monarchy",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son why China could maintain a long and stable rule was because it took virtue a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his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monarchical education, Bernier either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to the French monarchs and the crown princes, or implied a criticism of the autocratic French monarchy.

Key words: French translations of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François Bernie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s des Princ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Behind the Pseudograph: A Case Study on the *Lifaqi Cuoyao*, a Book Attributed to Matteo Ricci

Chen Tuo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Lifaqi Cuoyao* in *The Chinese Works of Matteo Ricci*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irst four collections of *Gaohou Mengqiu* written by Xu Chaoju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were plagiarized. It also refutes the argument that *Gaohou Mengqiu* was influenced by *Lifaqi Cuoyao*,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23rd year of Jiaqing (1818), and its author was attributed to Matteo Ricci for profit.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often regarded as a break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pseudo-books reflected the desire of some scholars who had the ambition to study Western learning, which made the pseudo-books profitabl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gery books are a cultural phenomenon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Key words: Matteo Ricci, Xu Chaojun, *Lifaqi Cuoyao*, *Gaohou Mengqiu*,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Life of A. Zottoli in Jiangnan and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ang Shuo

Abstract: Fr. A. Zottoli was a missionary from the revived Jesuit order in Jiang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more than 50 years in China, he inherited the old Jesuit polic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fields in the Jiangnan area, and cultivated outstand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such as Ma Xiangbo, Ma Jiangzhong, and Li Wenyu. He wrote and translated a variety of works, which had an impact on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n Western sinology. He was a famous translat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information about Zottoli's life is relatively scarce, and the academic world knows little about him. This paper tries to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Zottoli's life and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by using rare materials such as those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ves, missionary letters, and churc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Catholic missionary.

Key words: A. Zottoli, neo-Jesuit in Jiangnan area,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